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二十四期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

编者的话：大跃进时期有句“民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据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某某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什么人间奇迹都弄得出来。精神原子弹果然威力无穷，先弄出高产卫星，紧接着赤地千里，其效果相当于广岛那颗的一百多倍。

高产卫星自然是敲锣打鼓，普天同庆；赤地千里却无人认领，一半归了老天爷，一半归了老大哥。报上仍旧是新政权建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形势大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在隔绝、封锁、压制下竟然“大象无形”。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但事情还是一点点透露出来。记得当兵时忆苦，某战士忆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农村兵”们面面相觑，“城市兵”听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私下相询，个个目瞪口呆！

四十年过去，情形又不同。如今的中学课本这样告诉孩子：“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轻描淡写的五十七个字，每个字后面至少五十万条人命。

制造遗忘术显然是有效的。虽然去古未远，人证俱在，却已没有多少人再予关注，灾难就像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录史者王顾左右，亲历者三缄其口，后来人不知、不信、不感兴趣。更有甚者，或以“探索中的代价”敷衍，或以“敌对势力的诽谤”自欺，乃有以“中国人多得是，饿死再多也不见少”相轻薄。

人命关天。几千万条人命，几亿人亲历，怎么竟“忍”了？怎么竟“忘”了？究竟是何种基因，何种教育，何种文化，何种生存机制造就如此能忍、善忘，以至满不在乎的“群众”？难怪在那一场“史无前例”之后，又是一场“史无前例”……

“三年自然灾害”，难道仅仅是始作俑者的罪恶？五六十年代，革命觉悟空前高涨，传统的人伦道德残存无几，民主法制横遭批判，极权统治一杆到底，交往空间丧失殆尽。民可使由之。于是人民随统一意志之魔笛起舞，既做暴民，又做顺民，清算“敌人”时气焰万丈，遭逢压迫则逆来顺受，无数人默默死去，连抱怨声都难得听见。另一方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某些基层干部形同酷吏，其行为之残暴远甚旧时的保甲长。于是党干群互动，形势自然是一片大好。及至幻想破灭，真相愈益掩盖不住，很多人又换上另一副嘴脸，冷漠、自私、玩世不恭乃至冷血。从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都敢干，如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都不信，骨子里只分利害而不论是非善恶，这就是“遗忘术”的心理基础。

本期登出亲历者的两段回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它们提醒我们那饥饿和死亡的时刻；提醒我们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提醒我们在每一个数字的后面，都是一出家庭的悲剧，都是一段伤心惨目的故事；提醒我们这个民族无比深重的苦难和罪孽。

亲历无为大饥荒

杨金声

我家世代代生长在长江边上的安徽无为县。传说，当年曹孟德率领83万人马想从这

里渡江直捣建业，他站在江岸上，见江面浩渺，又无渡船，仰天长叹：此地无为也。故得名。] 古往今来，无为是鱼米之乡。

吃不饱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共产风刮得民穷财尽，饿殍载途。1958 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 28 斤，从 1959 年春季起，再降为 24 斤。县城和农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分别降为 17 斤和 16 斤。

市场上既买不到鱼肉等荤腥食物，也买不到豆类和豆制品。国家粮站米价是一角三厘一斤，黑市米 4 元一斤，我当时月工资 36 元，不够买 10 斤黑市米，全靠仅有的 24 斤口粮和 4 两菜籽油活命。

我是老师，正年轻，食量大，消化力强，24 斤口粮只够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饭都得两两计算。每周 16 节课，且大都排在上午，如只授一、二节课，食堂早餐的稀饭即使很浓稠，也舍不得多吃一分（学校食堂一斤粮票购一角二分饭票，付一角二分钱）；逢上午有三、四节课，早餐稀饭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条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饭票的稀饭，否则是撑不住的。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南二瓜（校内园地师生共同生产的），首先买一碗（限购一碗，学生也一样），填进空肚里，然后再买三分饭票的饭，绝不敢多吃一分饭。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后吃两三分饭票的饭，因晚上办公要到深夜十一点左右——反“右派”后的“大跃进”，谁敢不积极？早下班怕人说没干劲，思想落后，会受到批判甚至砸碎饭碗的。如果吃饭不顾后果地任饱，这个月的最后几天，就没饭吃，不死也会饿趴下。若遗失 10 来斤粮票或饭票，等于自绝生路，谁也救不了你。各家因饭票短缺或遗失，而互相猜疑、指责、谩骂，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齟齬、母女不欢、姐妹失和的事时有发生。有位中层干部有四个子女，每从食堂打回饭，按各人的供应标准，用秤分而食之（农村较普遍），谁也不敢多吃、多沾一点。

瓜菜代

整日饥肠辘辘，饿得人心发慌，逼得你非去寻找瓜菜或其他能吃的东西来充饥不可！那时大小会议上经常讲“低标准、瓜菜代”。秋冬交替，上级号召大搞“小秋收”，即采集野生植物、大秋收的下脚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极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丝肉、蚌肉等。县委副书记谢永康在一次动员大会上说，现在证明，凡是猪能吃的一切东西，人都能吃！

1960 年 10 月 26 日的县委常委会上，议定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下列 32 种（每种都有具体数字，共一亿斤，从略）：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高瓜（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杆、黄豆杆子、芝麻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菱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杆子、芡实杆子、螺丝、蚌肉等。其中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杆、黄豆杆子、芝麻杆子、花生藤、花生壳、荷叶杆子、芡实杆子等，连猪都不能吃！

为了充饥度命，早在 1959 年冬天，我们学校就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捞来红浮萍，洗净磨碎，搀一点稗子粉（稻田里稗子长得比稻好，农民割稗子当公粮交），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我至今仍记得，浮萍粑粑有一股青气，粗糙微涩，难以下咽，但饥肠难熬，只得勉强吞咽下肚，胃不舒服，呼呼作响，且有隐疼感，远没有茭瓜青菜萝卜充饥好受。一位同志告诉我，他在农村吃过苦涩难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吃

这种东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无为吏

严重的浮夸风造成高额估产、高额征购，调走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一点糊口粮，全集中在公共食堂，被基层干部把持着，成了卡农民咽喉的“鬼门关”。他们野蛮地、任意地克扣农民的伙食，农民吃多吃少，全凭生产队长一句话。而社员口粮再少，干部却照旧贪占，如顺口溜所云：“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基层干部的管理手段日益残酷。

1960年7月18日，县委批转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35人，他们对待群众不是耐心教育，而是克扣伙食，用打骂捆吊来推动工作和完成任务。被捆绑吊打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杀1人。

1960年11月27日，县委在《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中称：“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克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甚至有个别的采取恶劣手法，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强暴行为。”下面为具体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2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德明发现，当场狠打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小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2、“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因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广波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因而一天未给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3、“姚沟公社共产党员李德正捆打14人，1960年5月在第7队，把因偷吃青蚕豆的女社员叶玉英，用针线缝嘴。”

4、“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支部书记张朝正，因社员莫大喜有病，把田沟整理得粗糙一些，被张朝正一顿毒打，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秧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张朝正硬要他们下田栽秧，张本胜因浮肿病格外严重，上午栽秧，下午即死去。全生产队47户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户均被张朝正克扣过伙食，并摔碎社员打饭的饭钵10个，小饭桶1个，亮子（提水木桶，作打饭用）1个，脸盆（作打饭用）2个。”

5、“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长任俊寿捆打社员19人，其中被打外逃15人，死1人。社员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一天，他牵牛跌进水里，任俊寿硬说周可法装相，故意把衣服跌湿，不想下田劳动，周不服回了嘴，任俊寿当即打他两个耳光，并扣其早餐不给吃，周气得当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队长蒋瑜，1960年前后，共捆打社员24人次，因打致伤死亡2人。1959年10月，有一次蒋瑜召开会议，因天雨徐村有7名社员迟到。蒋瑜即拿棍子在路上，给每人打一棍子，到了会场有5人被罚跪，社员许以民因其老婆被罚跪不服，说了一句‘你就搞我们贫下中农。’蒋瑜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上，手扒在另一桌上，人身悬空，然后将两张桌子同时向两边拉开，使人跌下）的严刑，把许以民当场跌伤，未过几天即死去。”

7、据《无为县三反整风运动开展情况》文件内载：“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554人。石涧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84人，其中严重的59人。该社仅陈闸大队第6生产队长汪命生，从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46人次，其中被打伤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时间，就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昌桂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

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倪华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傅昌桂一顿毒打，伤重致死。”

9、“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支部书记丁家法，今年三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时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即死去。”

10、1959年春节刚过没几天，襄安公社青龙大队宣村生产队长宣观玉就要社员下田干活，有三个社员迟到，宣观玉开口就骂：“你妈的弄X，你们想不想吃饭？今天你们三人都给我站到塘里去，不要你们干活！”三个人还未来得及说明情况，生产队长宣观玉就伸手一个耳光说：“你们不想干活还有理由？你们不站到塘里去，就别想拿到饭票子！”三人为了中午能吃到那碗稀糊，虽穿着棉裤棉鞋，也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盖，寒冷的春水彻骨透心，冻得三个人满脸青紫，浑身发抖。幸亏一名骑自行车的干部路过，问明情况后直奔大队，半个时辰后，大队派人来，才将这三个社员从水中解脱。

11、大江公社官镇大队支部书记郭登甫，小组长张义文，群众称他俩人是“活阎王”。去冬，57岁的陈长河，因患浮肿病不能劳动，被扣伙食一天多，陈饿得没法想，便向张义文磕头要饭吃，张讽刺他说：“你脸上有肉，不吃没关系。”说过扬长而去，陈连气带饿，当场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春上，观音大队下令：“偷一次蚕豆罚款一元，偷两次罚两元，偷三次的全家清剿（抄家）。结果，一次清剿15户，清剿出社员家的财物，计有棉布13丈，麻袋2条，银元9块，铜钞9吊，食盐106斤，现金15元，布票12丈。剿出的东西全部没收。”

上述这类事在当时很普遍，不能一一列举了。

寻活路

俗话说：饥肠难熬，饿气难断。农民千方百计地去寻找能吃的东西来充饥度命。冬季无野生植物，有的就只有吃玉米叶、玉米皮芯。这种连猪也不吃的东西，既消化不掉也排不出，老年人就被活活胀死，年纪轻一点的夫妇只好躲在房间里关上门，互相从肛门里抠出不能变成粪的粪块。

不愿在家里坐以待毙的农民，自然想外出乞讨，或去城里投亲靠友。他们明知城里粮食供应，是按户口簿分等定量，吃食极为紧张，难以自顾，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他们冒险外出逃命。哪知无钱无粮票，寸步难行，何况饿得体的弱虚浮，走不多远就倒毙路旁。古书上说“饿殍载途”，今始信然。

更令人伤心落泪的是：家里饿死了人，不敢声张，不去报告，让他（她）仍睡在床上，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的。别人问起就说是生病不能起床，家里活着的人，照样去食堂给他（她）领来一份浪打浪的稀粥或米汤，让活着的人多吃一点，以保全生命。饿死的人都是骨瘦如柴，尸体干瘪，春夏气温虽高，仍可存放数天，直至尸体发臭，才向生产队报告：冬天气温低，尸体存放的时间要长一些，冒领死人的饭食的天数就多一些。但尸体存放的时间久了，引起干部们的怀疑，上门检查，揭开被子一看，常常是尸体上的眼珠已被老鼠挖吃掉了，脸、耳朵、脚趾均被老鼠啃咬得脱皮露骨，目不忍睹！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一两个地方，可以说，村村都有冒领死人饭食的。

人饿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什么东西都敢吃。我县黄姑镇附近有户农民，孩子饿死后，白天埋掉，晚上偷运回来，放在锅里煮了吃！人常说，虎毒不吃子，吃自己孩子的尸体，这是人饿得实在无法可想、万万不得已时，才这样残忍啊！但被公社的干部知道了，还把这户农民叫到公社训斥一顿。

当县委政法部长邱福田和建国公社书记汪建华亲眼目睹董圩大队两户姓洪的农民吃死

孩子立即向县里汇报时，却遭到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的训斥：“你们全是糊涂虫，没有政治灵魂，竟然相信这样的事！你们是只要肚皮，不顾国家。”

就在这年冬天，省委副书记张恺帆来到无为调查公共食堂（为此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张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姚奎甲为了让省领导听见无为人的“充足干劲”，生发奇想，把饥寒交迫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在城外高喊劳动号子，农民们喊的声音小，他就派人来指挥，通宵达旦，一直喊到张书记离去。

这位后来逼命催粮制造干劲的县委书记，“文革”时期，要不是电厂工人用钢筋焊一个铁笼子，将他保护起来，他定会被向他要儿子、要丈夫的愤怒农民，用木棍、石块活活打死、砸死！

反右倾

庐山会议后，中央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

姚奎甲为完成上级的高征购任务，为了不蹈他的上级和平级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覆辙，亲自下乡逼命催粮。1959年12月10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13天，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该公社即饿死7600多人，仅以三个大队的部分生产队为例：

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饿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45.7%。其中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原有人口858人，在13天的会议期间，就饿死395人，占人口总数的46%。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饿死78人，占人口总数的69.6%，全家饿绝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的王村，原有人口590人，饿死310人，占人口总数的52.54%；徐岗大队原有人口3625人，饿死2023人，占该大队人口总数的55.8%。

大结局

1957年底，无为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未统计。据此推算，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0000人以上。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我们安徽无为县来说，百分之百是人祸。

我县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河塘沟渠等存水洼地较多。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极少部分是棉花和旱谷，小涝小旱，山区圩区均能丰收。查对1958年到1961年我县的气象资料，无论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不存在旱涝灾害，基本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被饿死，岂能嫁祸于天？

（作者系安徽无为县某中学退休教师）

爷爷之死

虞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荒之年，许许多多的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我的家乡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市）在大荒之前有60万人口，按逐年增长的规律，人口应越来越多，但在三年后，人口却反而减少到50万。那10多万人都给饿死了。

在饥饿中，我家先后死去了好几位亲人。40多年过去了，亲人饿死的一幕幕惨剧始终晃动在我眼前，如同恶梦一般挥之不去。而我心中深深的伤痕也往往在回忆往事的那一瞬间被重新揭开，依稀可以窥见当年的血迹。

一

1962年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老宅“春华秋实”大院里气氛十分紧张，我父亲和幺叔以及几个姑妈正焦急地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为我爷爷准备后事，72岁的爷爷已经几天粒米未进了。

和爷爷一起度过了50多年光阴的奶奶是一个贤淑的传统型家庭妇女，她坐在爷爷床前毫无顾忌地痛哭着，好像爷爷已经死去了一样。

父亲的眼中充满了血丝，眉头紧锁，不停地叹着气。他是极孝顺之人，连着几天几夜都守候在床前。他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感到锥心般的悲痛。

爷爷最小的女儿、我六姑妈已暗暗擦了好多次眼泪。那时六姑妈32岁，就在去年，她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我六姑爹——一个曾任小学校长的年轻大学生在饥饿中死去了，而此时，她又将面临丧父。

四伯妈也在场。她刚过40，头发已白了很多，十多年来，她一直受管制，罪名是地主。每天黎明前，她都要去扫街，春夏秋冬，从不间断。1952年，她的丈夫——我的四伯父在三反运动中被打断胳膊后投进了监狱。四伯父九死一生，从奉节大山里的劳改营中活了出来，但是却没能躲过饥荒，今年春末，枯瘦如柴、受尽折磨的四伯父也死了。

爷爷静静地躺在那张陈旧不堪的木床上，在经历过反复的浮肿后，他的脸瘦得惊人，额头凸起，颧骨突出，面颊下陷，苍白的头发稀疏而凌乱，眼睛半闭，嘴大大张着。谁能想象，他曾是著名的才子，历任三县县长，做过杨森将军的秘书，写作了大量诗文，总纂了《忠县志》51卷及《忠县乡土志》，创作了剧本《巴曼子》、《卓文君》等，即使进入了共产党执政的时代，他也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如果不是饥饿，爷爷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二

爷爷没想到，在他的晚年会遇上一个旷古未闻的新事物——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象征出现的，起先在农村，后来在城市也推广起来，当时不准任何人自己开伙，一律集中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据说这样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饱读诗书的爷爷其实是极其开明之人，他对新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拥护国家的一切政策，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也许他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真的已经到来了，曾写了不少诗篇来赞颂新中国，如“建立中华号共和，全民高唱太平歌。火燔矿石钢花富，水溢田畴玉粒多。瞥眼频开新世界，迎头殊异旧山河。如今不履羊肠道，要向光明大道过。”但事实却无情地嘲弄了他的天真和善良，就在“全民高唱太平歌”的时候，大灾难已经悄然袭来。

大约是因为我家大院比较宽敞亦或我家比较顺从，居委会硬把公共食堂建到了我家。这样一来，院里每天都有上百人吃饭，活脱脱一个饥民集中营，于是我们便有机会目击了许许多多啼笑皆非的场面。

公共食堂刚建立时曾响当地喊出“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并预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即将实现，不料这种梦想很快就被铁的事实打得粉碎。饥荒迅速来临，树皮草根全成了“代食品”（那时的新名词），我家大院内那棵高高的梧桐树的皮也给剥下来吃了。

爷爷在他的日记中小心翼翼地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场面：

1959年9月17日，中秋节，居民百余人在我院公共食堂聚餐，早餐每人月饼二枚、糯米饭一碗，中午每人饮酒五钱，食猪肉牛肉各一两，其余概系蔬菜咸菜和其他副食品。

1959年11月25日，粮管站刘同志来伙食团指导改良炊饭办法，先用冷水将米泡三个钟头，又别换清水，每大米一斤加水一斤半，蒸到点多钟就熟了，四两米可以涨到二十两饭，但群众认为是稀饭。

1959年12月6日，清晨，外孙徐树隆送来蒸肉一碗，肉肥味鲜炙热可口，我二人饱餐一顿，机会不可多得，令人兴奋不已。

1960年1月17日，午后，智儿（即我父亲）买肉包子回来，（我二人）每人一枚，这种机会更不可多得矣。

从以上简略的记述，已不难窥见灾难之一斑。最可怕的灾难是在之后的1960年和1961年发生的，那以后爷爷的日记已经在政治运动中烧掉了。爷爷以七十高龄，如何受得了长期的饥饿折磨，久之，全身浮肿，双腿发亮，步履艰难，惟有跪伏床头终日呻吟。

那时有一种奢侈品叫“消肿粉”，经过特许，可以给年老的浮肿病人供应少许。这种所谓的“消肿粉”，其实就是谷糠，本来是做猪饲料的，但这时成了人人向往的营养品。爷爷有幸享受过少量“消肿粉”，终因杯水车薪（由医院一次配给一小药包），不能救饥饿于万一，爷爷的身体还是越来越衰弱了。

三

爷爷在短短两年内，目睹了自己的弟弟、儿子、女婿、侄儿、孙女孙子一个又一个在饥荒中死去。

爷爷的二弟（我叫他二爷爷），仅仅因为一个红苕便丢了命。那时公共食堂占用了二爷爷的房屋，二爷爷不得不从公共食堂厨房进出。有一天，饥饿难当的二爷爷从厨房过路时见四处无人便在地下捡起了一个红苕，不料被居委主任暗中看见了，当下便叫来一群打手将七十高龄的二爷爷抓起来，强迫他分开腿站在一个四脚朝天的长凳凳脚上接受斗争。斗争完了，主任一声令下，又将二爷爷结结实实捆绑起来押到了看守所。第二天，二爷爷便死在了监狱里，至今尸骨无存。

爷爷的长子（我的四伯父），死时只有48岁，临死拉着我奶奶的手说：“妈，我是您的儿子，我不能孝敬您了……”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奶奶抱住四伯父大哭，我父亲也扑到四伯父身上大声喊：“四哥、四哥。”四伯妈则瘫坐在地，用后脑勺狠狠地反复撞墙。那时爷爷就在四伯父的隔壁，相距不过三、四米，由于自己已病倒在床，更兼不忍看着亲生儿子死去，爷爷一直都没到四伯父床前去，只是躺在床上静听从隔壁传来的撕裂人心的哭喊声！

爷爷的女婿（我的六姑爹），被饿死时最多30岁，丢下六姑妈孤儿寡母（六姑妈一直守孀不嫁，今已70多岁了），爷爷老泪纵横，曾赋《浪淘沙·哭奎婿》一首志哀。

爷爷的侄儿，也就是二爷爷的次子，我叫他六叔，本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大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几至神经失常，平日里如同乞丐，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拿破竹棍，

六神无主，步履蹒跚，赤脚沿街游走。在二爷爷去世后不久也饿死在忠县东云公社长河村，我堂姐去收尸时，竟发现六叔至死嘴里还咬着一节生红苕，不禁伏尸大哭。

爷爷的孙女，我的三姐，年方 18，竟也活活饿死。三姐死时和我相距最近，大约只隔一尺多。那时我一直和奶奶同床睡，一壁之隔便是三姐的床，我晚上都是靠里睡，如果不是一层薄薄的木板相隔，我就等于睡在三姐身边了。那天早上奶奶起床后去隔壁叫三姐，连叫了几声没答应，原来三姐不知半夜里什么时候已死去了。

爷爷的孙子，我的九弟，只一岁便死去了。那时我父亲长年被派到乡下工作，制度苛严难回家，而母亲又因大炼钢铁日夜辛苦积劳成疾至大吐血，被送重庆住院治疗，一去就是三年，几次险些死去。九弟年仅一岁，父母均不在身边，厄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清楚的记得九弟那清秀可爱的面容，他死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看着他孱弱的身躯一阵抽搐，娇小的手脚无助地扭动，哇哇地啼哭了一阵便停止了呼吸。九弟的棺材很小，只有两尺长，像一口小木箱，邻居王某和雷某来将九弟的棺材送走时，轻轻一举便扛到了肩上。我跟着王、雷二人走出大院，他二人说，不用送，然后就扛着九弟从考棚方向去了。九弟埋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得知九弟的噩耗后，我妈妈在重庆的病床上哭了几天几夜。

爷爷在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后，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四

爷爷有孙子 10 个，孙女 8 个，加上外孙外孙女则更多。在所有孙辈中，爷爷最喜爱我，从小我就和爷爷奶奶一床睡觉，爷爷为了伴我入睡，要背着我在院坝里反复地来回走动；爷爷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大约在我四、五岁时，他将废报纸裁成三寸见方的纸片，每张纸片用毛笔写一个汉字教我读写；爷爷还经常给我和所有姐弟讲历史故事，讲文学名著，讲得最多的是《聊斋》，我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在昏黄的油灯下，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慈祥的爷爷。他吃力地想把头抬起来，但不行，父亲见状赶紧示意我快说话，于是我按父亲教我的话轻轻问爷爷：“爷爷，你现在心里安然吗？”（安然：方言，意即感觉好。）爷爷浑浊的目光望着我，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安然……就是……说话……提……提不起气……”一会儿，他半闭上了眼睛，嘴里吐出游丝一般的奄奄气息。

我回过头来，发现旁边的长辈们眼中都泪花闪闪。

父亲和幺叔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回了堂屋。兄弟姐妹们一下围了上来，问爷爷怎么样了，我就把刚才见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了一遍。正说着，突然从爷爷房里爆发出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其中奶奶和六姑妈的声音最为凄厉，这时正是三更时分，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在黑暗中震撼了整个大院，紧接着鞭炮也响了起来。我们知道，就在这时，爷爷撒手西去了。那年我十岁。

爷爷的墓地在城东州屏山荷花池附近一片翠竹中。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台，草草地堆了一些乱石和泥土，爷爷就长眠在那里了。

两年后，可怕的“四清”运动到来了，一批打着革命旗号的流氓为了表现阶级斗争的觉悟，丧尽天良地掘开了爷爷的坟墓，将他老人家抛尸荒野，然后毁掉棺木，将坟墓夷为平地。一生善良正派、饱读诗书，为地方文化事业做过许多贡献的爷爷，竟连尸骨也没留下。

作者简介：虞廷，1952 年生，1968 届初中生，文革后考入四川大学。在社会底层沉沦多年，

当过农民、工人、商人、秘书、记者、编辑等，发表大量作品。现任重庆某报副主编，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